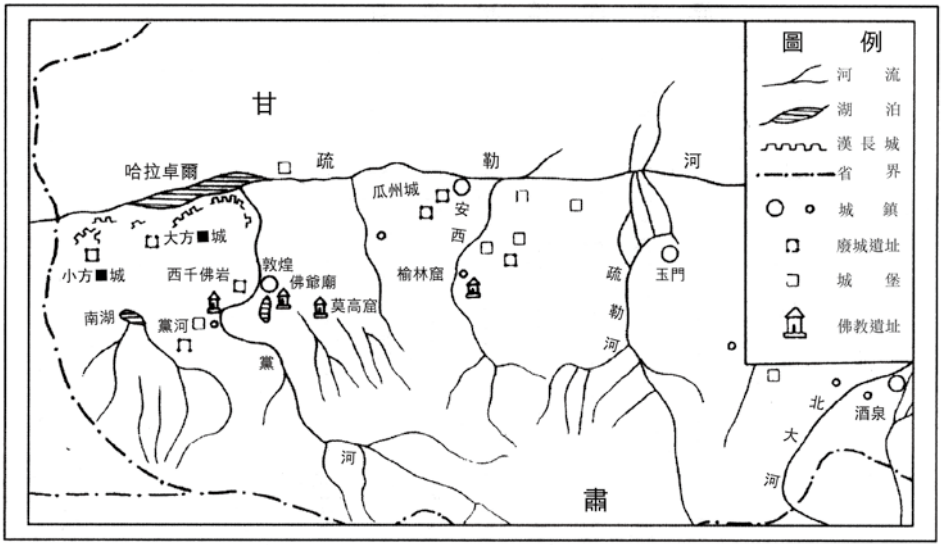
敦煌學概論

姜亮夫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圖例
河流
湖泊
漢長城
省界
城鎮
廢城遺址
城堡
佛教遺址
甘
哈拉卓爾
疏
勒
河
瓜州城
安
西
大方■城
小方■城
西千佛岩
敦煌
佛爺廟
莫高窟
榆林窟
南湖
黨河
黨
河
疏勒河
玉門
北大河
酒泉
肅

敦煌附近地圖

前　言

柴劍虹

1900 年 6 月 22 日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重新面世，石破天驚，舉世矚目。隨即，因藏經洞大量珍貴古代寫本流失海外，一門代表「世界學術新潮流」的敦煌學迅速形成，而迎立潮頭的國內學者卻寥若晨星；至於遠赴歐洲尋訪敦煌寫卷的僅數人而已，之中就有姜亮夫先生。姜老晚年，曾幾次同我談起他 20 世紀 30 年代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抄寫敦煌卷子的情景，大約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含辛茹苦，廢寢忘食。他是自費去的，在巴黎這個「世界藝術之都」裡，自甘寂寞，遠離塵囂，捨棄一切消閒，伏案埋首於故紙堆中，不僅要節衣縮食，費神傷目，而且放棄了獲得博士學位的機會。20 世紀 90 年代初，姜老的視力已經衰減到只能勉強辨認眼前的指影，但每當他對我講起在歐洲的辛勞，便雙目炯然有光，流露出無悔無怨的剛毅神色。

在我國老一輩的敦煌學家中，姜亮夫先生不僅是第一位撰寫普及敦煌文化與敦煌學知識讀物的名家（這有 1956 年出版的《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一書為證），也是第一位在高校開辦敦煌學講習班的大師，這本《敦煌學概論》就是根據他在 1983 年的講課錄音整理而成的。《敦煌學概論》是我國第一本講述敦煌學的簡明教材。姜亮夫先生以自己走上研治敦煌學的親身經歷與感受入題，娓娓道來，飽含愛國主義的情感與對年輕一代的熱切期望，推本溯源，深入淺出，從影響人類歷史發展的高度來評述敦煌學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價值，又言簡意賅地介紹了敦煌文獻與藝術品的豐富內容，講授了如何研究敦煌寫卷的方法。一本不足八萬字的小書，其內涵之豐富，學問之廣博，感情之充沛，均非一般的高頭講章之所能及，也絕不亞於一些皇皇巨著。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本小書是姜先生一生教學與研究敦煌學的結晶，也是他治學精神與人格魅力的集中體現。姜老生前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傳統文化的普及工作。他對普及敦煌文化與敦煌學知識高度重視並身體力行，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反映了他的遠見卓識。因為沒有普及，提高便失去了堅實的基礎；沒有普及，人才的培育就缺乏充沛的營養。姜老開設敦煌學的講習班，撰寫

普及性的讀物與教材，既開了我國高校培養敦煌學專門人才的先河，也是讓更多的學人感受「世界學術新潮流」的有益嘗試，這在敦煌學史上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我常常感慨遠隔萬里的浙江與敦煌之間的緣分。姜老是雲南昭通人，青年時代北上求學，又遠赴歐洲尋訪國寶，後歸國任教，飽受顛沛流離之苦，最後定教席於杭州大學。於是，浙江學子有幸，能在一位大師的諄諄教誨下耕耘楚辭學、敦煌學、語言學的園地，培養出了數代學術精英。我自小生長在西子湖畔，算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而且與姜老的愛女姜昆武還是「杭高」同級學友，但因 1961 年到北京師範大學學習，畢業後又到新疆任教，無緣涉足姜老門牆；然而，我既與大西北有緣，亦與敦煌有緣，終於得以在姜老晚年多次親聆大師的教誨。尤其讓我難以忘懷的是，姜老在病榻上和我談得最多的話題，就是如何為年輕學子創造更多更好的學習進修條件，去完成老一輩想做而未能做成、做好的課題。

1983 年 8 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蘭州成立後，根據包括姜老在內的著名學者的建議，中央批給學會一筆經費，用以開展敦煌學的資料整理、學科建設與成果出版。當時學會專門撥了幾萬元錢，作為姜老敦煌學著作的出版

補貼。可是，姜老一直捨不得用，想用來扶植青年人。有一次，姜老針對杭大古籍所裡有的負責人與年輕教師鬧矛盾的事，動情地對我講：「對青年人要發揮他們的長處，真心地培養他們。如某某人，有發展前途，就應該給他創造機會，比如送他出國去進修。研究中國古代語言的，不光是懂俗語詞，有條件還要多學外語，學習古印度的梵文，學習古代西域那些少數民族語言，我們的敦煌學研究才能彌補空白，老一輩未做成的事才能做好。」當時，出於對姜老健康的關心，教育部的一位領導曾勸他「垂簾不聽政」。他跟我說：「這我恐怕做不到。」確實，他一直在過問、關切所裡的事，絕非為了被有些人看重的權力，而是為了教學與研究的順利進行，為了年輕人的健康成長。1994 年夏，杭大幾位青年教師陪我到浙江醫院去探望姜老，當時他已不能說話，恐怕眼睛也看不見我們，可一聽見我們的聲音，馬上露出笑容，並伸出手來和我們緊緊相握，表達了他對後輩的關愛與期望。

斯人已逝，事業長存。我想，這本《敦煌學概論》再次推出，也是對姜亮夫先生最好的一個紀念。十八年前《敦煌學概論》在中華書局初版時，我有幸擔任此書的責任編輯，這大概是今天北京出版社的同行委託我寫這篇「前言」的一

個原因。八年前姜老仙逝時，我曾趕回杭州為他送行，當時很想寫一些悼念的文字，卻久久不能下筆。去年召開紀念姜老百歲誕辰的學術研討會，我寫了一篇重新閱讀《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體會的文章，終覺得言猶未盡。這篇「前言」，就算是一點補充吧。

2003 年 11 月 22 日

目　錄

001 ／ 第一講　我與敦煌學
025 ／ 第二講　敦煌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
048 ／ 第三講　敦煌經卷簡介（上）
072 ／ 第四講　敦煌經卷簡介（下）
101 ／ 第五講　敦煌藝術內容簡介
118 ／ 第六講　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
152 ／ 附錄：《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節錄）

第一講　我與敦煌學

我是從一無所知慢慢走到喜愛敦煌學的，其間經歷，相當艱苦，許多條件不允許我做得很痛快，是輾轉地想着法子，拼拼湊湊地把這個工作做下去的。現在想起這段經歷來，一面覺得有些不舒服，另一面卻又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在條件如此不充足的情況下，居然讓我做成了一些事。

敦煌學之所以吸引了我，與我的興趣及我的家庭教育和老師教育有關。近年來，我有一個關於教育的設想：就是一個做科研工作的人一定要同他自身的一切條件相配合。條件有兩種：一種是生理條件，一種是社會環境。譬如一個人記憶力很好，他可能搞歷史；另一個人理解力很強，他就適於搞哲學或自然科學。所以，一個人生理上的特點，與他的前途、成就，有很大的關係。在此，我想講講自己生理上的優劣。老師、親友往往說我的天賦是比較強硬的，但是，我

自己覺得是一個很遲鈍的人。也因為遲鈍，才引出幾件事情來。其一是我一輩子不做欺騙人的事情，一輩子讀書都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從頭做起，不敢偷懶的，也就是說自己知道廉恥。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因此，我在學術研究道路上，就有一種毫不為人所難的脾氣。30 年代，在很艱難的條件下，靠教書積攢起來的幾個錢，到歐洲去。假如沒有這個戇脾氣，我自然也不會鑽進敦煌學，因為那個時候，我沒有地位和經濟支持。等我到了巴黎，看過幾十個博物館以後，才下決心把我國文物搞回來。為此，我連從巴黎大學得博士學位的機會也放棄了，聽從王重民先生的話，加入他們的行列。這個行列，當時在歐洲只有三個人：王重民、向達和我。他倆是以公費到歐洲去的，我卻是自費的。因此，我奮鬥的範圍是比較小的，王重民先生分我搞漢語音韻，我自己稍微擴大了一點，也搞儒家經典、道家經典等卷子。假如我不是戇頭戇腦的話，哪個不想得個博士學位歸國呢！生性使我這樣。另一方面是家庭和老師的教育。我父親是雲南東部昭通十二州縣光復時的領導人之一，年輕時，就接受梁任公、章太炎先生的影響，是非常愛國的人。他平常教我愛國思想，從小就要我讀格致教科書等科學知識的書。總結父親給我的影響，主要是這兩方面。有一回，我躲在稻草堆下看《紅樓

夢》，被父親發現了。他啟發我：孩兒，你要看《紅樓夢》，是怎麼看的？講給我聽聽。我怎麼講得出來，不過是看故事嘛！父親就說：裡邊的人仔細看看，到底有哪些人？你給我找出分別來。我得了這個題目，《紅樓夢》是仔仔細細地看過的。所以，現在還稍稍有點《紅樓夢》的知識，雖然，從那以後，我不看了，從中學畢業到考上大學，再也沒有看過。我想我的情況對大家會有所啟發的，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自己，首先了解自己應該走甚麼路。譬如搞敦煌學吧，有的人對搞佛教經典有興趣，有的人對搞儒家經典有興趣，有的人可能有興趣搞歷史，也有的人想搞藝術，等等，因人而異。你們對於自己的思想、生活及性情脾氣有個了解以後，走起路來是輕快的，是能夠堅持到底的。不然的話，見異思遷就完了。我父親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動，他喜歡文天祥的《正氣歌》，幾乎每年都要寫一次，並且都寫成大的條屏，可以在牆上掛的。所以，我八歲時就把它背熟，父親給我講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愛國主義思想，恐怕要數父親的影響來得大。

我也有缺點，一生脾氣很戇的，到處和人家不合。解放初，我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因為拿出去，人家不歡迎，發表以後要受批評的，所以，就不發表，這是我的缺點。我不

大聯繫群眾，但是，我一生職業是教書，所以，我對青年是熱愛的。為了青年，再大的苦我都吃得，這也是我的脾氣。

我從事敦煌學，也同這脾氣有關。早年在四川讀書，一位老師教我讀詩詞，告訴我朱彊村的《彊村叢書》收的第一種詞集是敦煌發現的，即《雲謠集》曲子詞。從此，我開始知道敦煌有材料，但是，還不懂。後來到北京讀書，王國維先生經常告訴我們：某個東西敦煌卷子裡邊有，你們去看看吧！某個東西敦煌卷子裡邊也有，你們去看看吧！因此，我經常去清華圖書館找敦煌的東西看，從此，產生興趣。及到後來，見了王重民，要我去搞敦煌的音韻卷子，我同意了。抄了許多卷子，拍了許多照片，又看了許多壁畫。伯希和的《敦煌圖錄》給我很大的啟發，在這本書裡，我發現我們整個文化史裡許許多多的東西，突然愛好敦煌藝術了。抗戰期間，我正在四川，他們組織了一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請了三個人：向達、常書鴻和我，要我們到敦煌去設計一下。向達和常書鴻去了，我沒有去。向達回來告訴我敦煌藝術的體系是怎麼樣子的，又給我看了許多照片，更激發我對敦煌藝術的愛好。當時，我在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教書，由於找不着材料，身邊只有從巴黎拍攝回來的幾百張敦煌卷子的照片。既然不能研究敦煌藝術，就研究敦煌卷子吧！但

是，時刻想念着敦煌藝術。這個時候我在讀五代人的詞，看到許多同敦煌藝術有關係的材料。記得有個學生來問我：《木蘭詞》的「對鏡貼花黃」怎麼個講法？他說：我們看了若干書，都講不出來。我說我從《敦煌圖錄》裡看出來了。原來唐末五代的婦女喜歡剪些花鳥貼在臉上，譬如剪個蝴蝶、牡丹花，甚麼蟲鳥之類，貼在臉上。後來我又在溫庭筠的十八首《菩薩蠻》詞（專講婦女裝飾的）中下工夫，拿敦煌文物來證明溫庭筠的詞，得到了說明。不過，我這個說法多少還是一種感性認識，還沒有落到理性，等到我在三台做了三年多的研究工作，完成了《瀛涯敦煌韻輯》之後，才從感性轉到理性。這裡不單單是讀讀詩詞而已，而是整個敦煌文物都在說明與中國全部文化有關係。因此，我轉而搞歷史，搞音韻學。這個時候，我完成了幾個東西，一個是《瀛涯敦煌韻輯》，一個是敦煌傳記，譬如關於敦煌王的傳記，那時稱陀西王，有兩家：張家和曹家。我給他們作了很詳細的注解，補了《唐書》和《五代史》。還寫了一篇關於敦煌科學家的傳。以上是我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兩個階段，從藝術品慢慢地轉入遺書。到現在為止，我仍然以敦煌卷子為基礎，到底有些甚麼結果，很難說。我也不敢說我取得的一些結果就完全成熟了，現在也還想加深、修訂。

把五十年來的成果，一樣一樣地說一說，可能對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同志有些幫助。我的成果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校錄，即將敦煌卷子拿出來校對並抄錄，有次序有系統地搞；一類是研究。校錄工作往往為研究工作做基礎，根據校錄好的材料進行研究。但是，我的研究工作追不上校錄工作，因此，現在還有不少校錄的東西只能成為校錄，沒有法子進行研究。當然這也是直接與敦煌學有關係的東西。

另外，是為敦煌學而做的工具性的東西，譬如我把敦煌所出的佛教經典做了個統計，得了一個結果，對我們將來研究敦煌學可能有用處。

我還做了一些敦煌卷子的摘錄。這些東西沒有法子考證，而是為以後研究提供一種方便的。譬如說敦煌卷子有一個尺度：卷子多大、多長，每行多少字等，有一定規矩。這個卷子寫完以後，最後寫甚麼人寫的，誰翻譯的，也有一定規矩。我就把敦煌大德、敦煌寫僧、敦煌寺觀全部摘錄下來，讓研究敦煌的人，根據我的摘錄，推測其他沒有著錄的卷子的時代。從哪個經生寫的，可以知道這是哪個時代的卷子；從某個經典有這個人名字，可以知道它是甚麼時候寫的；這個經典是哪個廟宇的，只要看看這個廟宇的相同經典，就知道了，等等。所以，現在研究卷子的人，都可以利用我這個

摘錄做工作。這種校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工具性的東西，要稍稍多講幾句。編工具書這件事，我們研究學問的人，非做不可，可惜有些學人不大看得起工具書和編工具書的工作。回憶我的老師王國維先生，他每研究一種學問，一定先編有關的工具書。譬如他研究金文，就先編成了《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把所能收集到的宋代、清代講金文的書全部著錄了。他研究宋元戲曲，先做了個《曲錄》，把宋元所有的戲曲抄錄下來，編成一書。所以，他研究起來，就曉得宋元戲曲有些甚麼東西，哪個戲最早，哪個戲最晚，哪個戲同哪個戲的關係怎樣，歷史關係怎樣，地理關係怎樣，人物關係怎樣，等等，都清清楚楚。他的《宋元戲曲史》雖然是薄薄的一本書，但是，至今已成為不可磨滅的著作。因為他的東西點點滴滴都是有詳細根據的。所以，我也喜歡做工具書，我不怕人家笑話我：你這個專家為甚麼編工具書，做一個編工具書的人呢？我並不以此為恥，反而認為做工具書是我們每個學人應當負起的責任。如果我們每個學人都負起責任來做一些工具書的話，那麼，好些工具書都可以及早做出來了。舉一兩個例子，顧頡剛先生在燕京大學教書，領着許多年輕同志做引得。這些引得，把某書的某個問題完完整整地顯示了出來，我們現在都深得這八十一種引得

的方便。我研究《楚辭》，也做了一個引得，因此，《楚辭》的每一個字共出現過幾次，也是清清楚楚的。研究起來，把有關的全部很方便地找齊，《楚辭》裡邊的這個字，總共有幾個意思，哪個是本義，哪些是後來變義，都可以辨得清清楚楚。所以，工具書是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做的，直到現在，我做工具書的興趣也不減弱，甚至有許多東西，我乾脆就抄錄人家現成的。譬如我有一份劉師培先生著作的書目，就是把他做的書、文章，一條一條地抄錄下來的。我要是做起文章來，就把劉師培先生這個東西翻開一看，材料都在一起，就拿下來了。所以，工具書是一定要做的，現在的情況，是太少了。在我們研究所裡，要提倡這種風氣，每人都要爭取做一兩本工具書。你是研究《周禮》的，就做《周禮》的工具書；你是研究《尚書》的，就做《尚書》的工具書。這些東西也是我研究敦煌學的基礎，是我研究整個學問的一個極好的基礎。我的書桌上，書目一大堆，大概有一尺多高，都是我自己抄的，雖然它不是真正的敦煌學研究，但是，我研究敦煌學是確確實實這樣做的。譬如《瀛涯敦煌韻輯》這本書，寫好以後，我把它分類摘抄，反切抄一個，小韻抄一個，大韻抄一個……抄了五六種。不久前來了一個進修生，要讀《廣韻》，我就把這一套東西給他利用，結果把《廣韻》讀通了，也是靠工具書。

我的關於敦煌卷子的校錄，大概有如下幾種：一種是對經典的校錄，以《詩經》、《尚書》為最多。關於《詩經》和《尚書》的校錄，我差不多完整了，所有敦煌卷子都收在裡頭了。我的《詩經》校錄，武漢大學有位教授要，我就抄給他了。他根據這個寫了一本書，叫《鄭康成毛詩箋》，所以說，這個東西是有用處的。《尚書》校錄，我仍在做，要努力做成的。除了《詩經》、《尚書》而外，我還有《春秋左氏傳》、《周禮》、《禮記》等校錄，看來不能再繼續了，沒有這份精力了。

第二種是諸子的校錄，集中力量搞《老子道德經》。所有敦煌《老子道德經》的卷子都抄錄完整了，並且已經寫成一篇兩萬字的論文，題為《〈老子道德經〉的研究》。關於《道德經》，下面還要講，這裡先提兩件很有趣的事情。第一件是關於書名。《道德經》是現在的名稱，幾年前在山東銀雀山發現漢初寫本，不叫《道德經》，而叫《德道經》，倒轉過來說的。這是一個大寶，我的一個朋友得知以後，高興得很，寫信告訴我。我說在敦煌卷子裡已經發現了同樣的情況。第二件是關於字數。據《史記》說，《道德經》是五千言。不少敦煌的《道德經》卷子，每章標有字數，合起來為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僅差一字。有人說應當是五千零幾十個字，那麼，太史公講五千言的可靠成分到底在哪裡呢？我認

為靠得住的成分是百分之九十五，靠不住的是五千多倆字還是少倆字。可見，敦煌卷子可以證明史書的記載，這些都是很有趣味的東西，研究古籍的人遇到這樣問題高興得很，所以，我做校錄是比較用力的。

第三種是《道德經》以外的道家經書。佛教有個《大藏經》，是把佛教經典匯集起來的大書，故叫「大藏」。杭州大學有過一部《嘉興藏》，是在嘉興刻的，這是最了不起的《大藏經》，兩三年前被中國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調走了。這部書，據我所知，在全國只有三個完整的本子，其他都殘了。這部書是明末人刻的，先在南京刻，後來在蘇州刻，最後在浙江完成，所以，取名叫《嘉興藏》，本名叫《徑山藏》，俗稱《嘉興藏》，其雕版大概早就毀掉了。道教也有類似的書，宋代開寶年間刻過一部道家的藏經，稱《道藏》。《道藏》收的藏經，當然分量也很多，但是，我在敦煌卷子裡邊，細細地找，發現有《道藏》還沒有刻過的道經，就此做了一篇文章，叫《敦煌本道教佚經考》，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重視。校錄工作只是初步的，我對道教並沒有研究，只是校錄，校出了這篇文章，成為大家重視的東西，也是我做校錄工作中自己比較滿意的東西。此外，還有韻書的校錄，我用了四個本子：一本是拍攝的照片，一本是抄錄的內容，一本是寫的提要，一

本是做了框格。韻書校錄是我最早完成的敦煌學研究工作，匯集成了《瀛涯敦煌韻輯》二十四卷這部大書。校錄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問題，如韻書卷子中有一卷，就是王仁昫那一卷，一個地方有一點胭脂，我很奇怪：為甚麼卷子上會有胭脂呢？問了很多人，都弄不清楚。我看過的卷子大概有六千多卷，沒有發現第二個有胭脂的卷子。那時我在四川三台，和我愛人是兩張桌子兩塊硯，她講：這個東西是否有道理。從此我就注意了。翻了唐宋以來許多人的書，發現唐代宋代明代都有一個傳說，說唐代長安有位女仙人，叫做吳彩鸞，每天晚上都要抄一部韻書，拿去賣給赴考的讀書人，所以，吳彩鸞抄過若干部韻書。這番話假若是一個人寫的，也不足為奇，但是，唐宋兩代人都寫，就連一生說話忠厚老實的歐陽修，在他的《歸田錄》裡也說了這件事，就是說，他也相信這一傳說。我認為有些道理，然後回想到這個卷子可能就是吳彩鸞抄的。於是，我着手研究為甚麼會有這個故事。我研究了唐代讀書人的風氣、唐代婦女的風俗習慣、唐代的考試制度，等等，寫成一篇論文，就叫《吳彩鸞書切韻事辯》。大意是這樣：唐代婦女的性格不像宋以後婦女那樣軟弱，倒是很精明強幹的，肯定有這樣一部分人，幫助丈夫出去考試，寫一部韻書給他帶去。唐代人考試一定要做詩，做詩一定要

做長律，做長律背不了那麼多的韻，要家裡人幫他寫一部韻書，帶着進考場。所以，並不是說她每天晚上寫一部韻書，每天晚上寫一部韻書是文人好奇，故意擴充的，而是說有一個女人。這個卷子的字像女人筆跡，非常秀麗，不是男人手筆。唐代寫經人很多，三萬卷都是男人寫的，都是和尚道士寫的，只有這個卷子是女人筆調。所以，我就肯定這件事情是有的，不過，唐代人喜歡吹牛，所以，唐代傳奇把稀奇古怪的故事傳給大家，那時風氣如此。確實有一個婦女寫了這樣一部韻書，給了丈夫去考試，流傳下來就成為「女仙」。這件事情可以說明：我們每研究一樣東西，一定會牽涉到若干問題。在我們文化史上要有一點發現是不容易的。抓住一個敦煌卷子，可以做一輩子工作。我有一位年輕朋友，讓我給他選一個卷子，他研究了三十年，還不敢肯定。這個卷子是說一個廟子裡的經濟，今天某佃戶借了幾升米，若干年以後，這個人還了好多米；某人又借了多少銀子，後來又怎樣……就是這樣一批賬目。我叫他去研究唐代寺院經濟同整個社會經濟的關係，他寫成了一篇論文，比較草率。我說你很多東西還不了解：你了解唐代的僧祇律嗎？你了解唐代寺院裡的田地是不納稅的嗎？他又從頭到尾翻「兩唐書」，花了兩年半的工夫，文章作了修改，結果還有較大的欠缺。我說

除此而外，你還沒有比較，應該拿這篇文章同其他材料作比較。現在仍在修改中。所以，我們在文化史上做一件對我們文化有所幫助的事情，真是不容易。真正要做好這樣一篇文章，要花一輩子的精力。假如把這篇文章做好了，唐代整個經濟制度裡邊最重要的經濟組織部門也研究清楚了，這就是對我們文化史的大貢獻。向達先生寫成《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這部書，我很讚賞。後來，給他提了個意見，他也回了信。我說：你的書好得不得了，但是，我希望你在這裡邊選兩個突破前人的問題，深入研究，使第二個人不能在你這上面添加一分材料，這樣的文章寫上兩三篇就夠了。他對我的意見非常贊同，他說：那麼，你看我這本書還是本通俗書。我說我不敢說是通俗書，但是，我們更需要你做更詳盡更精深的一兩篇文章，我們沒有第二個人能反駁你了，文章就算做到底了。

我研究敦煌學是如何開始的呢？七七事變的前兩天，我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過偽滿洲國回到北京。我是逃出來的，那時候許多朋友勸我不要走這條路，和我同路的人有一個遇害了，我還好，總算冒險回來了。不過我帶回來的東西在滿洲里被日本人全部拿走了。幸而關於敦煌學的這部分材料以及許多考古學的材料沒有帶在身邊，而是由一個公司給

我寄回來的。到北京後，本來準備在北方教書，但是，情況不對，老朋友都勸我到南方來。就在我離京到天津的那天，盧溝橋事變發生了。天津站的站長也是我的老朋友，他要我趕快走，說這兩天天津也要發生事情。因此，我趕快到南方來，不幾天，果然盧溝橋事變又發展了，上海也開始抵抗了。於是，我帶着從法國運回來的書和照片，在蘇州一個小旅館裡，做起校書工作來。這與我搞敦煌學以及後來的發展很有關係，在當時條件下，這是我搞敦煌學的一個試驗。我用國外所得的敦煌材料，同國內已發表的校對。第一件工作是校對劉半農先生的《敦煌掇瑣》，對校的結果，使我無法繼續下去。劉先生這部書原是中央研究院刻的，錯誤很多，僅 S. 2011 卷，即王仁昫《刊謬補闕切韻》一種，全卷共一千一百行字左右，可是，我校出來的錯誤竟有二千四百條之多。校完此書以後，我打定主意，將敦煌卷子裡的韻書部分進行全面整理，這是我研究敦煌學的第一件工作。東北大學從北京搬到西安，我跟到西安；後來又從西安搬到四川，我又跟到四川。《瀛涯敦煌韻輯》的稿子就是在那裡搞出來的，花了整整三年的工夫。全書分二十四卷，是鄭振鐸先生給我印的，他當時是上海出版公司的老闆。我花了三年工夫，得到的收穫是甚麼呢？我發現近來所有研究中國古代韻書的人基

本上都用《廣韻》這部書，原來《廣韻》以前的韻書都亡佚了。我這部書剛好填補這個空白。

與此同時，我又寫成一本《敦煌志》，由於分量太大，沒法印出來。後來將總論部分改寫成白話，單獨出版，書名就叫《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這是我最早的成書，而《韻輯》是第二本。《敦煌志》除了總論以外，多已散失。為甚麼呢？我在西安時，把文稿寄往成都，不久就得到郵局通知，說有一條船在漢口至重慶之間，被日本飛機炸了。我寄出的文稿也蒙受大難，餵了魚。後來我把留下來的零零碎碎的稿子匯集起來，收在《敦煌學論文集》中。《敦煌志》雖然早損了，可是，我至今念念不忘，因為它收集了敦煌卷子中關於文學方面的卷子（包括詞、變文）以及歷史材料、社會材料，是很費了一點工夫的。抗戰勝利後，我到了上海，才看到日本大谷光瑞編的《敦煌文集》，覺得可補的東西太多了，所以，更惋惜《敦煌志》的亡佚了。將來有機會，我可能再補，但是，看看現在的身體，恐怕不大可能了，因此，希望別的同志能把這個東西補起來。體例、規格，都存在於我的心裡，假使哪位同志願意做這個工作，我把我的規格告訴他，我的材料也可以提供出來。

《敦煌學論文集》又是一本甚麼樣的書呢？此書共收論

文三十八篇，已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久就可以出版。集中收集了我所有關於敦煌學的文章，其中不少是專門研究，也有作為工具書性質的文章。譬如《敦煌學私議》，就是關於研究敦煌學的詳細規劃。「三錄」即敦煌高僧的《名字錄》、敦煌抄卷子人的《名字錄》和敦煌的《寺觀錄》，根據「三錄」，可以核對全部的敦煌材料。譬如根據人名可以斷定卷子的時代；根據廟子的名字，可以看出這個廟子在甚麼年代存在；看見寫僧的名字，也就知道這個寫僧是哪個時代的。所以，「三錄」可以幫助我們給卷子斷時代。我們研究學問的第一件主要事情就是要弄清楚研究對象的時代，不然的話，這個東西研究出來，還可能有問題。《正俗字譜》說明在唐以前的韻書就有正、俗字了。將來我們搞文字學，可以根據這個字譜來分辨正字和俗字。《敦煌學論文集》裡，至少有五分之一是這些工具書性質的文章。我可能還沒有做完，因為我當時得到的卷子只有倫敦、巴黎和柏林這三個地方的收藏品，至於日本和蘇聯的卷子，我都沒有見到。那麼，將來研究日本、蘇聯乃至其他別的地方的卷子，也可以參考我的這些文章。

這個集子裡專題性的研究文章約分兩種：一種是關於韻書的考證；另一種是關於歷史材料的研究。後者重要的文章有四篇，簡述於下：

第一篇是講敦煌王張議潮父子的事跡的。我根據唐代的資料及近代人的研究成果，替他們作了一個詳細的傳。

第二篇是關於敦煌王曹家幾代人事跡的。我也替他們作了一個詳細的傳，而且還列了一個世系表。

這兩個家族確實在我國歷史上起過一定的作用。他們在我國的西北地區，同周圍的兄弟民族接觸甚多，在唐五代，中原沒有受到甚麼干擾，可能與張、曹兩家在敦煌那個地方看守大門有關。同我們的歷史文化有這樣大的關係的兩大家族，應該詳細給他們寫傳。

第三篇文章是《補〈五代史．方技傳〉》。關於科學的史料，敦煌卷子裡極少，不過，也發現了幾個「曆」。敦煌這個地方原來是自己頒曆的，它有一個特殊的曆法，作者叫翟奉達。我認為他是個了不得的人，於是就寫了這篇文章。寫成後，聽說向達先生也在寫這個人，於是，與他通信，問他是怎麼寫的。原來他是根據翟奉達的歷史，來考證敦煌這個地方同翟有關係的人士以及當時的社會情況的。關於曆書，雖然也說了一點，但是，沒有我這樣完整，所以，我們兩人是可以互相補充的。我的文章，他想要，我就給他看了，結果佚失了。我很想恢復這篇文章，可是，老底子只有一些卡片，「文革」中又幾乎損失殆盡。為了寫成這篇文章，我曾翻閱了

中國歷代的若干曆書、史書，從而發現翟氏編著的曆書是很有特點的，以至宋代以後的曆書都吸收了它的成果，故而，在中國文化史上，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努力補寫了出來。

第四篇是關於文學的。在敦煌洞窟中發現了南朝宋代和尚智騫的一個殘卷，他是用楚國的語音來讀《楚辭》的，因而，他的這個卷子在國內成了大家注意的東西。最早研究它的是王重民先生，不過他只寫了敘錄，沒有怎麼深入。深入的是聞一多與周祖謨兩位先生，他們兩位的文章，當時我沒有見到，到了解放以後，來到杭州，才看到。不過以前我雖沒有讀過聞先生的文章，但是，他給我講過。那時，他在西南聯大，我也在昆明。我的文章，他看過以後不大愉快，為甚麼呢？因為我的話同他的話許多是矛盾的，不過，他還是說：好吧！你說你的，我說我的。現在看來，聞一多先生的文章自有他的長處，他寫的東西有我沒有說到的，但是，我也有我的是非，因此，這篇文章我保留下來了。四年前，《社會科學》雜誌創刊號登了我這篇文章，編輯加了按語，說我這篇文章提出了三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是，我以為還有一個重要問題，他們沒有講到，那就是智騫的這個東西，在唐以前被認為是個了不得的東西，吹得太高了。聞、周二先生似乎

也是這樣認為的，而我不但沒有這樣認為，反而幾乎否定它。這不是甚麼創見，只是這個東西在做書的體例上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同時又是我們後來研究《楚辭》的重要參考書。在這本書以前，人們都是以儒家的立場和觀點來讀《楚辭》的，到了智騫，他採用不同的學說，把《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奇奇怪怪的書拉來證《楚辭》，從而，在《楚辭》研究上形成了一個流派。關於這一點，《社會科學》的編輯同志沒有講到。

關於韻書，我的《瀛涯敦煌韻輯》有一篇文章，叫《切韻系統》，現在把它抽出來，收進《敦煌學論文集》。這篇文章說明了一點：我國已經亡佚了的《切韻》，在敦煌卷子中發現了，而且有幾個卷子就是陸法言原書的抄本。這在研究聲韻上是很重要的歷史材料。不過，這部《韻輯》發表快三十年了，國內卻很少響應，國外雖然有人響應，可是，也沒有人像我這樣重視它。我寫好這部書以後，拿它同《廣韻》核對，得出一個結論：《廣韻》這部書是宋人雜採唐代諸家的學說湊成的，因此，其系統性和科學性都是不夠的。說這個話是有點大膽的，因為有人迷信《廣韻》這部書，可能會引出大的爭論來。那很好嘛，要是我失敗了，那就肯定《廣韻》是了不得的書；要是我勝利了，那就說明我這部書是有用的。我有個脾氣，就是我的學說希望有人反對，不希望人們完全贊

同。反對不了我，我就成立了；反對了，你成立，這樣學術上就有了一個定論。以上就是我的《敦煌學論文集》的簡介，它是我研究敦煌學的第三本書。

第四本書是《老子道德經卷子的研究》。關於《老子》的卷子，我看到的幾乎可以說完整了，日本和德國都沒有這個卷子，只有法國和英國有。頂好的卷子是伯希和拿走的，伯希和這個人對漢學的研究很深，所以，他拿去的卷子都是非常精緻的。我對他很討厭，但是，又佩服他。為甚麼呢？他治學很嚴謹，書也讀得很多。有一張他盜竊藏經洞的卷子時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裡，面對許多經卷，正在蠟燭光下一件件地翻檢……他告訴我，他拿去的卷子在所有敦煌卷子裡幾乎都是最好的。所以，我們今天研究敦煌卷子應該以在巴黎的卷子為基礎。過去說這話是要招大禍的。

敦煌卷子的紙質、墨色、寫的情況都有很大的差別。《道德經》卷子的紙幾乎都是非常講究的，特別加工過的，紙質硬實，至今一千多年了，拿出來還會發出吭喳吭喳的金石聲。並且，每一個字都寫得好，我們後來的一些字帖，就採用敦煌的《老子道德經》卷子的。佛教經典的卷子後面不一定有甚麼了不得的寫僧的名字，而《道德經》卷後的寫僧都是有名的，甚至有幾個是高僧。這是件很特別的事情，和尚

來寫《道德經》，而且是在唐代儒、釋、道三教鬥爭很嚴重的時候。其實，也不足為奇，因為唐代帝王自稱是老子之後，關於這一問題，今天暫且不去論是非。但是，唐代帝王尊崇老子，會不會影響當時的寺廟呢？會不會引出一些捧場的和尚來抄《道德經》呢？我想是有可能的。因此，《道德經》的卷子抄得極好，校勘得非常認真，如果一個字有點小毛病，就用黃顏料把它塗掉並改正過來。除了儒經中有時有這個現象外，其餘的經卷都是沒有的。《道德經》的卷子數量不多。在敦煌也發現了其他道家經典，就寫得馬虎了。譬如《莊子》在六朝以後，常與《道德經》一起，而被稱為《南華經》，就沒有《道德經》寫得好，紙差，字也差，校勘也差。《道德經》寫得最好，除了上面所講的外，大概還有以下的原因。唐太宗以後，道家的勢力慢慢地大起來了，佛教內部腐朽的東西也越來越多，許多廟子裡養起兵和娼妓來了。和尚驕橫跋扈的情況，在唐代的文獻中屢見不鮮，而道家卻少見。道家興起之後，絕對禁止這些東西，因此，民間對它的信仰還在，而對佛教的信仰則大大地減少了。這時，佛、道互相敵視，互相攻擊。其實道教有許多是抄佛經的，其目的是讓民間知道，佛教的那一套，我道教也有，從而勸大家不要相信佛教。到了五代末期，道教大興，因而，當時《道德經》寫得好，與

佛、道自身的情況也是有關係的。

還有兩項研究成果，也簡要地說一說。一項是關於儒家經典的輯錄與研究，我把重點放在《尚書》和《詩經》這兩部書上。《詩經》的研究在我的《敦煌學論文集》裡已有了一個提要。大體說來，現在所傳的《詩經》，同敦煌本的《詩經》有很大出入。現在傳世的本子收集了其他所有注家的注，使《詩經》好讀一點；而敦煌本在語法上似乎不大相同，文字也很有差別。傳世的《詩經》頂早可能是宋代的刻本，可能是經過宋人修改過的，而敦煌本的《詩經》和《尚書》的許多字比我們現在傳世的本子好。但是，好儘管好，卻不通俗。宋代人讀《詩經》和《尚書》，可能看到原先的刻本，以為字太艱澀，便改為通俗字。這樣一改就糟了。因此，我們可以根據敦煌卷子的《尚書》和《詩經》來校對我們現在所傳的本子，這當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尚書》、《詩經》的敦煌卷子，國內學術界要的人很多，我有工夫就抄一點給他們，《詩經》卷子，抄給黃焯，《尚書》卷子抄給顧頡剛。但是，現在看到的顧先生關於《尚書》的論著，卻沒有引用，大概是篇幅所限的原因吧。將來我有精力，要填補這個空白的，假使精力不濟，也要指導一個學生替我做下去。

另一項是《莫高窟年表》，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原是七十萬字的稿子，前面還有兩百多幅圖片，都是莫高窟最重要的圖片。底稿是用毛筆寫的，寫得規規矩矩，如果哪個規模大一點的圖書館要的話，我就送給他們作藏書，因為我自己也沒法子保存。這本書我原來打算把敦煌卷子裡有年代可考的，按年代編排。這樣一來就能很好地看出各個時代的風氣，看出各個時代對不同經典的重視情況。譬如在唐明皇時，《金剛經》、《金光明最勝王經》是特別重要的，而它們在別的時代就不大重要了。這是我寫這部書的目的之一。另一個目的是，把中國歷史上同宗教有關係的材料補進去。譬如唐明皇時，儒、釋、道三家是如何鬥爭的？我把歷史上有關的材料找出來，附在唐明皇時代的敦煌卷子後面。如唐明皇自己給《金剛經》加注，給《孝經》加注，給《道德經》加注，顯然是想調和儒、釋、道三家，讓全國在他的調和思想下安定下來。這些歷史材料，我都附在有關的敦煌卷子後面。又如有一個卷子是王羲之那個時代的，於是，我就把王羲之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跡以及他寫的《蘭亭序》都抄錄出來，附在這個卷子的後面。又如某個卷子說某一時代頒佈了僧祇律，就在它的後面把僧祇律的詳細內容附上。又如某一個卷子為一個日本人詳細考證過，我就把這些考證文章翻譯過來，附在這些卷子的底下。這樣一來，所附的材料很多，

我想對了解中國的文化史是很有幫助的。但後來出版社的同志認為太複雜了，為了簡便起見，於是就把這些附錄全刪掉了，只剩下一些敦煌卷子。《莫高窟年表》也就只有骨架，沒血沒肉了，書名也只得改成《莫高窟資料編年》。那些被刪掉的附錄，全部毀掉了。「文革」中，幾次被抄家，連稿子也抄走了，看來恢復原樣已經不可能了。現在我把這個被刪的殘本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即可出版。這本書現在只有一個用處，即作為工具書來用。不過用它時，要先查索引，看看有沒有你要查的東西，然後再看看我的文字，這樣一來，這一缺陷就可以彌補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能幫我印出來，我得感謝出版社對學術的關切。

總之，我的研究成果就是這麼幾點，沒有甚麼了不得的，比起我的同輩向達、王重民先生來，我不及；比起我的老師王國維、陳寅恪先生來，相差更遠了。我這一生最大的缺點就是東一鄘頭西一棒子，撒得太開，到現在，我已經不大可能收拾了。不過好在我們的國家現在事事都向前走，將來的敦煌學肯定是有希望的。我現在只不過是一匹識途老馬，這匹老馬已經不能載重了，但是，這條路我曾經走過一段，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這條路怎樣走，怎樣爬山、涉水啦……我力所能及的大概就這一點了。

第二講　敦煌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

本講擬從歷史發展角度來談一談敦煌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這個問題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大段：第一大段是唐代以前，第二大段到唐代為止。唐以後不講了。重點講印度文化同中國文化的關係，如印度哲學到中國來以後，給中國文化一些甚麼影響，中國文化受了印度思想影響之後，成了一個甚麼樣的局面，等等。

我認為中國文化史上有過三次大變化、三個時期。第一是春秋時代。從考古學上看，關於夏商周的歷史記載差不多是比較正確的，夏商周三代一脈相承的文化到春秋結了一個穴。主要原因是夏商兩代文化剛剛進入半文明社會，而它的發展是以黃河流域為基礎的。這個黃河流域西起現在的新疆、青海、西藏，東到現在的山東、河北。周家本來是西方民族去的，它同夏家是有關係的，可能夏家是一個靠北方偏

西一點，就是現在陝西、甘肅之間的民族。周這個民族就是陝西、甘肅之間的民族向東走的，到東方來之後，同殷民族交鋒了，殷民族是東方民族。周家本身以夏文化為基礎，吸收了殷文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尚書》中箕子為武王稱《洪範》，這是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個影子。我只能說影子，因為《洪範》有好多成分是真的，好多成分是假的，還不能斷定，但確實是一個影子。《洪範》這篇文章把殷家的乃至於夏家的整個文化的重點幾乎都說出來了。周家以後的文化大體根據《洪範》來，不過周人也有自己的特點。它的特點是甚麼呢？原來周文化總結了夏文化之後，承認我們人同自然的關係，並在人的關係上固定下來，它就是宗法。周家以前無所謂宗法社會，而是氏族社會，或氏族社會的早期。周家把宗法社會定下來了。宗法社會有兩個很重要的連鎖反應，它們又是統一的。一個是傳子，即傳嫡長為賢的繼承問題，一個是財產遺傳問題。夏商兩代沒有這兩個問題。父親死後，王位一定傳給兒子，而且一定是長子，只有母親是王后，才能繼王位，假如母親是妾，就是第一個生下來也不行。以天命關係定王位繼承，繼承以後，不管你是甚麼樣人，好的，天下也算你的；壞的，天下也算你的。這樣一來，家庭內部沒有糾紛，國家也初步可以安定。譬如武王得了天下以後，

傳給成王，成王是個小孩子。國家初年紛亂得不得了，幸好周公把着他的關，所以後人説周家這些宗法制度的完成、政治制度的完成都靠周公。很可能他參加過重要意見。即使殷家的降虜同周家的不肖子孫勾結起來謀王位，也搞不下去。為甚麼會勾結起來搞呢？就是夏商兩代並不一定傳嫡立長，哪個有本事就哪個上來做。但是，周家只要你是嫡子，即使不肖之子也傳給你。王位定了，內部無所爭。王位定了，國家的財產歸了你，所謂「家天下」。這個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幾千年來不變的局面。連周家分封的諸侯也是這個制度，國家成了天下的共主，叫大宗，諸侯成了小宗。但是諸侯在他的國家內，又可以自立為大宗，他的大夫便成了小宗；大夫要是有本事，得了封邑，也可以成為封邑裡的大宗。層層下達，把天下統一在血統關係上，別人不能驚擾它。在中國歷史上，周家天下最久遠，同它有很大關係。在這個情況下，慢慢形成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等等。各人搞各人的，每個人都在周家制度下找一條路子走。宗法制度對民間風俗的影響大得不得了，一個父親把家當掙了起來，假如有三個五個兒子在那裡爭吵，是不得了的。所以國家宗法制度行到民間來之後，成了民間風俗的樣本。總結這個歷史過程是在春秋，春秋最重要的人物當然是孔子和

老子。一個儒家，一個道家，把中國文化吸收在他們的學說裡。孔子提倡人倫，即五倫，老子宣揚「毋爭」。「毋爭」對人們有很大的影響。老子時代正是春秋戰國爭執得最厲害的時候，所以，老子提出不要爭，以柔弱為做人的基本，以不爭為做人的方法，來求得安定。孔子把宗法制度總結成儒家的人倫制度，形成儒家的道德範疇，它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做基礎來安定社會。封建統治階級很自然地吸取儒家思想，使它成為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道家思想則被一些成年人奉為一生行事的規範。這兩個思想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兩個最大的思想體系。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儒家發展到漢代更盛了，主要原因是秦始皇統一天下和漢武帝罷黜百家。所以，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之後，紛雜的思想不講了，漢家從高祖起強調以孝治天下，這兩個東西成了漢代立國的根本。這兩個東西調和下來之後，成為漢家的主要政治措施，也是民風的趨向。到了漢武帝以後，突然發生了一種反面思想，就是昭、宣、元、成之後突然間有所謂今文之學出現。原來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百家之學在朝廷站不住腳了，全部逃到民間去躲藏起來，根據他們今文家的傳說寫了許多書，即所謂讖緯之學。讖緯之學大大興盛，幾乎把高祖所定的規模全部搞掉。但是，儒家

在武帝支持下，已經大大發展，而儒家經典也已普及全國。因此，儒生起來同今文家鬥爭。今文家自己也說得自孔子，不過，他們自己也承認，孔子說的關於國家政令的東西，他們沒有看見。從此，今古文鬥爭開始。倒也奇怪，武帝以後，尤其在宣帝時，漸漸地黃老之說出來了。道家清虛自守，於是，做皇帝的也清虛自守，讓天下安安靜靜地過太平日子。今文家同道家有許多地方相類似，是否偷了道家學說，我不敢斷定。今文家從天文、宗教、迷信等許多方面來籠絡人心，並且在昭、宣時期幾乎達到了目的，但是，勢力還不大。所以，等到光武起來以後，反對讖緯之學，今文學垮了，然後古文學興起來了。漢家政治思想、民間思想仍然恢復到儒家的人倫制度去。到這個時候要變了，東漢時期，佛教已進入中國，漸漸地中國士大夫和民間受到很大影響。但是初來的並不是釋迦牟尼的真宗教，而是印度老的宗教，他們用各種方法宣傳佛教。漢代讀書人尊重老子，所以，漢末、魏晉之間，道家學說大盛。嵇康、阮籍不用說，甚至謝靈運、陶淵明也有道家思想。但是佛教學理還沒有廣泛地傳進中國來，最重要的經典也沒有完全進來。這時候，有位平陽人，是山西平陽，不是浙江平陽，叫法顯，是個和尚，俗姓龔。他同另外兩個人到印度取經，成為中國第一個到印度取經的

人物，前後大概八九年，回國後，寫了一部《佛國記》。這是一部世界上關於旅遊的最早最大的書，可惜亡佚了。他把印度的戒律《摩訶僧祇律》翻譯了出來。印度哲學分三大部分：經、論和戒律，戒律就是講怎樣修養自己，到唐代就成了十戒，中國從此有了戒律。於是北方和尚，每個人都學戒律，成為高僧大德，品德極高。這裡有段插曲：法顯坐船回國，被漂到美洲，到了墨西哥，所以是中國法顯第一次發現美洲，並不是哥倫布。他發現美洲之後，一看不是中國，就坐船回來了。這件事，《佛國記》裡有，然而記得不詳細。現在，墨西哥發現了很多法顯所留下的遺跡，法國人研究得最精細，我們中國還沒有人研究。日本也在研究。有本《西遊記》，過去商務印書館把它譯了出來，現在買不着了。要是在舊書店裡看到了，趕快買，這本書同中國文化的關係太重要了。他發現美洲以後，美洲才開發出來。現在墨西哥的許多民情風俗，與我國近似，這是法顯起了作用的。他把中國文化帶到美洲去。這是插話。也是從法顯開始，中國到印度取經的人慢慢地多了，印度的大德、大僧也不斷地到中國來了，大的經典也帶來了。中間關係最大，唐代不說，唐以前應該是鳩摩羅什，又叫什公、羅公。他來中國以後，中國才有三論宗的東西，所謂三論宗即是講《十二門論》、《百論》